

宋诗话中的楚辞评论

李大明

宋代诗歌评论，自欧阳修始有《诗话》之作，效者蜂起，蔚为大观。欧阳氏自题其《诗话》云“集以资闲谈”，谓集录诗人琐事轶篇和对名篇佳句的品评谈艺。后许颢《彦周诗话》自题又云：“诗话者，辨句法、备古今、纪盛德、录异事、正讹误也。”此言诗话的目的和内容，颇为全面具体。其为文则短札谈片，颇似随意闲笔，但记述诗人事迹、考证文句、阐发和赏析诗意，实有助于文学批评。其中的屈原和楚辞评论，在屈原思想行为的评价、楚辞作品的训解阐释、楚辞与历代文学的关系等方面，不但对前代楚辞学者的观点有继承、发挥或补充修正，更有一些新鲜见解，表现出宋代文人研习楚辞的心得、他们的诗歌好尚和文学价值观，值得我们注意。本文拟对这些问题作一番考察，这对宋代诗歌理论和宋楚辞学史的研究，将是有帮助的。

(一)

对屈原思想行为的评价历来是楚辞评论的一个热点。宋诗话中有一些这方面的评论意见，请略论如次。

葛立方《韵语阳秋》卷七有一段专论屈原行为。其文从《论语·公冶长》孔子评宁武子之语说起：“孔子谓：‘宁武子，邦有道则智，邦无道则愚。其智可及也，其愚不可及也。’所谓及者，继也，非企及之及。谓宁武子之愚而后人不可继尔。居乱世而愚，则天下涂炭将孰拯？”案：检孔子之评宁武子，并没有指责他居乱世而愚的行为，这和《卫灵公》中孔子说“君子哉蘧伯玉，邦有道则仕，邦无道则可卷而怀之”的意思是一致的。然则葛氏所言，实在是对南渡后时政和个人遭遇不幸的有感而发（葛立方曾因忤秦桧而获罪罢官，高宗绍兴二十六年归休。成《韵语阳秋》，书中时有梗概不平之气）。

基于这一认识，葛氏指出：“屈原事楚怀王，不得志则悲吟泽畔，卒从彭咸之居。究其初心，安知拯世之意不得伸而至于于是乎？”这一议论着眼于屈原的“不得志”、“拯世之意不得伸”。西汉刘安曾评屈原“正道直行，竭忠尽智以事其君”；“虽放流，睠顾楚国，系心怀王，不忘欲反，冀君之一悟，俗之一改也。其存君兴国而欲反复之，一篇之中三致志焉，然终无可奈何”（见今本《史记·屈原列传》）。葛氏所言，盖本于刘安。

但是，在君子处世之道这一点上，葛立方并不真正理解屈原。屈原“拯世之意不得伸”之后，又该如何办呢？《韵语阳秋》卷八的回答是：“余观渔父告屈原之语曰：‘圣人不凝滞于物，而能与世推移。’又曰：‘众人皆浊，何不淈其泥而扬其波？众人皆醉，何不哺其糟而

啜其醢？’此与孔子‘和而不同’之言何异？使屈原听其说，安时处顺，置得丧于度外，安知不在圣贤之域？而仕不得志，猬急褊燥，甘葬江鱼之腹，知命者肯如是乎？”案葛氏这番议论，用的是传统的消极避世、明哲保身的人生观批评屈原的思想行为。两汉以来，在楚辞评论中，一直存在着用全身远害观念批评屈原的意见，我在《论王逸对评价屈原不正确观点的批评》（《四川师大学报》1985年6期）、《魏晋南北朝文人论屈原与楚辞》（《四川师大学报》1990年2期）二文中详有所论，今不赘述。而如葛立方所引扬雄、班固、刘勰、孟郊、孙郃等人贬斥屈原的言论，正是这一消极倾向的代表。如扬雄云：“君子得时则大行，不得时则龙蛇。遇不遇命也，何必湛身哉？”（《汉书·扬雄传》）班固云：屈原“露才扬己，竞乎危国群小之间，以离谗贼。然责数怀王，怨恶椒、兰，愁神苦思，强非其人，忿怼不容，沉江而死，亦贬清洁狂狷景行之士。”（《离骚序》）刘勰云：“依彭咸之遗则，从子胥以自适，狷狭之志也。”（《文心雕龙·辨骚》）孟郊云：“三黜有愠色，即非贤哲模。”（《旅次湘沅有怀灵均》）孙郃云：“道废固命也，瓢饮亦贤哉。何事葬江水，空使后人哀。”（《古意》）然则葛立方之言，实乃上述言论的翻版。又检之葛氏本人，在逆忤秦桧罢官、归休吴兴泛金溪上，自题草庐曰：“归愚识夷涂，游宦混捷径。”（《韵语阳秋·自序》。其文集亦名为《归愚集》）此虽系牢骚语，却没有“居乱世而愚，则天下涂炭将孰拯”的豪言壮语了。由此以观其评论屈原的两段文字，不但说明他并不真正理解屈原坚持真理、九死未悔的崇高志向，也可以使我们窥见其在仕途险恶的环境中企图“安时处顺”的复杂心态。

有意思的是，葛立方的同时代人、著名楚辞学者洪兴祖在《楚辞补注》中有一段议论可与葛氏评论互参。须知，洪兴祖知真州时曾刻葛立方之父葛胜仲的《丹阳集》，并作《序》赞扬葛胜仲不阿权贵的行为（参拙文《洪兴祖生平事迹及著述考》，《四川师大学报》1989年2期）。洪兴祖与葛立方关系非同一般，所以比较二人对屈原思想行为的不同评价，是很有意义的。洪氏在王逸《离骚后叙》之后针对“或曰：原用智于无道之邦，亏明哲保身之义，可乎？”的议论指出：“愚如武子，全身远害可也。有官守言责，斯用智矣。山甫明哲，固保身之道；然不曰‘夙夜匪解，以事一人’乎？士见危致命，况同姓，兼恩与义，而可以不死乎？”又论屈原之死云：“生不能力争而强谏，死犹冀其感发而改行，使百世之下闻其风者，虽流放废斥，犹知爱其君，眷眷而不忘，臣子之义尽矣。”据我考证，洪氏撰成《楚辞补注》是在他知饶州期间，时绍兴二十四年十一月以前（该月他被秦桧党羽王珣诬陷弹劾，十二月被编管昭州）。以他与葛氏的关系，立方当得见其书。也就是说，葛立方是很可能了解洪兴祖上述议论的。他后来撰写《韵语阳秋》，也从宁武子谈起，不能说与洪兴祖议“愚如武子”没有一点联系。但是洪兴祖议宁武子，议山甫明哲保身，归结到“士见危致命”，“生不能力争而强谏，死犹冀其感发而改行”，更指出后世之遭流放废斥者要闻其风而立志，不忘君臣之义。相比之下，葛立方的“安时处顺”，力求在被废斥后能避患全身的思想，就消极得多了。

《韵语阳秋》卷四又有“司马温公亦有《五哀诗》，谓楚屈原，赵李牧，汉晁错、马援，齐斛律光皆负才竭忠，卒困于谗而不能自脱。盖有激而云尔”之语。卷八又说司马迁“初遭李陵之祸，不肯引决而甘腐刑者，实欲效《离骚》、《吕览》、《说难》之书，以抒愤悱”。此本之司马迁《报任少卿书》而立言。这两处评论从侧面略及屈原“负才竭忠，卒困于谗而不能自脱”，赋骚“以抒愤悱”，录以备参。

其它宋诗话中直接对屈原思想行为发表的评论并不多见。范晞文《对床夜语》卷一认为《楚辞》中“惟草木之零落兮，恐美人之迟暮”（《离骚》）、“沅有芷兮澧有兰，思公子兮未敢言”（《九歌·湘夫人》）、“望美人兮未来，临风恍兮浩歌”（《九歌·少司命》）等“皆爱君惜时之词。后世拟之者不过徒法其句耳，非其意也”。这番议论虽意在“辨句法”，但从侧面反映出范氏对屈原思想行为的评价。“爱君惜时”一语，也多少有些概括性。又，刘表臣《珊瑚钩诗话》卷二议“端午”之号云：“端午之号，同于重九；角黍之事，肇于风俗。昔日屈原怀沙忠死，后人每年以五色丝络粗粒以吊之，此其始也。后世以‘五’字为‘午’，则误矣。”案《艺文类聚》卷四引《风俗通》云：“五月五日以五采丝系臂者，辟兵及鬼，令人不病温。亦因屈原。”《初学记》卷四引《续齐谐记》又云：“屈原五月五日自投汨罗而死，楚人哀之，每至此日以竹筒贮米，投水祭之。”然则“端午”之俗由来尚矣，民间亦是日祭屈原，诚如张氏所言是因为“屈原怀沙忠死”（此说亦本之《史记·屈原列传》）。张氏所议，虽意在诗话的“录异事、正讹误”，亦从侧面反映了他对屈原的评价，故略论如此。另，阮阅《诗话总龟·前集》卷十六引《剧谈录》记唐末洪州衙前军将某某题岳州屈原庙诗云：“苍藤古木几经春，旧祀祠堂小水滨。行客漫陈三酌酒，大夫元是独醒人。”《剧谈录》本唐人康骈所撰，阮阅采入诗话。今亦录以备参。

（二）

以上略论宋诗话对屈原思想行为的评价。但是从总体上看，诗话作者更喜爱对楚辞作品发表评论，进行诠释阐发。他们似乎并不怎么喜欢象前人那样陷入屈原思想行为的论争之中，也不象晁补之、洪兴祖等楚辞注家那样比较系统地总结前人的那些论争，而是更乐于楚辞谈艺，乐于在短札谈片中提及自己的心得和见解。诗话的体制决定了这一特点。当然，我们所说的楚辞谈艺，包括思想内容和艺术特征两个方面；其中谈对楚辞作品思想内容的理解涉及到对屈原思想行为的评价。但是为了行文的方便，我们一并放在本节进行讨论。

《珊瑚钩诗话》卷三论诗之语体有云：“幽忧愤悱，寓之比兴谓之骚”。此语即从《离骚》的思想内容和艺术特点两方面立言。昔司马迁说屈原“忧愁幽思而作《离骚》”（《史记·屈原列传》）。王逸亦云：“屈原履忠被谮，忧悲愁思（洪兴祖《楚辞考异》：‘一作忧愁思愤。’），独依诗人之义而作《离骚》”（《楚辞章句·离骚后叙》）；“《离骚》之文，依《诗》取兴，引类譬喻”（《楚辞章句·离骚叙》）。刘勰亦云：“楚襄道丧，而三闾忠烈。依诗制骚，讽兼比兴”（《文心雕龙·比兴》）。可见张氏之言，大抵依从前人旧说，但言简意赅，颇为精当。而其云“幽忧愤悱”，又与葛立方所云“以抒愤悱”语义为近，可以互参。

严羽《沧浪诗话·诗辨》云：“工夫须从上做下，不可从下做上。先须熟读《楚辞》，朝夕讽咏，以为之本。及读《古诗十九首》，乐府四篇，李陵、苏武、汉魏五言，皆须熟读。即以李、杜二集枕藉观之，如今人之治经。然后博取唐名家，酝酿胸中，久之自然悟入。”《诗评》又云：“读《骚》之久，方识真味。须歌之抑扬，涕泪满襟，然后为识《离骚》。否则为戛釜撞瓮耳。”宋：严氏论诗，强调“学诗者以识为主”（《诗辨》），重视对诗歌鉴赏能力的培养。而要“识”，就要能“悟”，所以他说“大抵禅道惟在妙语，诗道亦在妙悟”（同上），这是借禅宗用语来谈对诗歌的领会。而“悟”之所得，就是所谓的

“味”、“真味”了。此等言语为宋人所津津乐道（如戴复古《论诗十绝》、魏庆之《诗人玉屑》卷五引吕本中《童蒙训》等，不抄），严氏亦用以评论楚辞，并翻出新意。他认为，对楚辞特别是《离骚》要“熟读”、久读，下大功夫，并视为学诗的根本，然后才能“悟入”，才能“识真味”，由情产生“味”，即：“歌之抑扬，涕泪满襟，然后为识《离骚》”。这一见解是很深刻的。诚如明人陆时雍《诗镜总论》所说：“诗之可以兴人者，以其情也，以其言之韵也”，“古人善于言情，转意象于虚园之中，故觉其味之长而言之美也”。盖《离骚》“言之美”，故须“歌之抑扬”；“味之长”，则读之“涕泪满襟”。而陈辅《陈辅之诗话》引“六一云：屈原《离骚》读之使人头痛，然摘三句反复味之，与风雅无异”。艺心好尚不同，故有是言。而将严羽之论与之相比。其高下优劣，不言自明。

对于其它楚辞作品，严羽亦有所论。《诗评》云：“《楚词》惟屈、宋诸篇当读外，此惟贾谊《怀长沙》、淮南王《招隐操》、严夫子《哀时命》宜熟读，此外亦不必也。”这是对前引“先须熟读《楚辞》”一语的说明。在全部《楚辞》作品中，他认为除屈、宋外，汉人拟作只有三家可取，余如东方朔《七谏》、王褒《九怀》、刘向《九叹》、王逸《九思》皆在不必读之列。宋人亦有类似议论，如沈作喆《寓简》推许《惜誓》、《招隐士》和《哀时命》，而曰“余如脱故著新，勿复论”。朱熹《楚辞集注》对汉人拟作亦只录贾谊、庄忌、淮南三家，《楚辞辨证》上又称：“《七谏》、《九怀》、《九叹》、《九思》虽为骚体，然其词气平缓，意不深切，如无所疾痛而强为呻吟者。”严羽之论，盖本于朱子。《沧浪诗话·诗评》又云：“《九章》不如《九歌》，《九歌》、《哀郢》尤妙。”“前辈谓《大招》胜《招魂》，不然。”案：旧说谓《大招》为屈原（或曰景差）所作，《招魂》为宋玉作。朱熹《楚辞集注·大招序》认为景差所作，并云：“虽其所言有未免于神怪之感、逸欲之娱者，然视《小招》（即《招魂》）则已远矣。”然则严羽之言盖针对朱熹。严氏重视诗歌艺术，故能脱出“前辈”窠臼。后如明人杨慎《丹铅杂录》卷八驳朱熹之论，而王世贞《艺苑卮言》卷二赞杨慎“言《招魂》远胜《大招》，足破宋人眼耳”。实则“破宋人眼耳”，恰恰是宋人严羽。

宋诗话中对楚辞作品还有一些评论。如《珊瑚钩诗话》卷一认为“古之圣贤，或相祖述，或相师友”，“屈原作《九章》，而宋玉述《九辨》”。此论讲宋玉对屈原的师承，有一定道理。但宋诗话中也有某些故作高论的欠妥意见，如《西溪丛语》卷一引《李君翁诗话》疑《卜居》为宋玉拟作，《韵语阳秋》卷六认为王逸、韩愈等言屈原赋凡二十五篇没有根据。李君翁以庾信《哀江南赋》有“诛茅宋玉之宅”一语而立言，孤证难立；葛立方则无视《汉书·艺文志》明载“屈原赋二十五篇”，正所谓疑其不当疑也。

宋人论诗，喜于用事造语的考释阐发，即“辨句法”之类，宋诗话中对楚辞文句亦有不少考据和品评。其中有不少新颖独到的谈艺心得，足以启迪后人；也有一些故作深解的牵强附会之词，其末流则弊在琐碎支离，曲解屈、宋用心。下面举例略作讨论，以见其基本特点。

《离骚》云：“余既滋兰之九畹兮，又树蕙之百亩。”此以滋兰树蕙喻培育人才。宋代却有人要从中考证出兰贵蕙贱，从而引起争论，成为热门话题，足以资闲谈。胡仔《茗溪渔隐丛话·后集》卷一引黄庭坚语：“兰似君子，蕙似士夫。大概山林中十蕙而一兰也。《楚辞》曰‘予既滋兰之九畹兮，又树蕙之百亩’，以是知不独今，楚人贱蕙而贵兰久矣。”

(黄说原文参其《书幽芳亭》)洪兴祖《楚辞补注》在“纫秋兰以为佩”句下引山谷语,又注云:“九畹盖多于百亩矣。然则种兰多于蕙也。此古人贵兰之意。”洪氏亦以兰贵,但山谷以少为贵(“十蕙而一兰”),洪氏以多为贵(“九畹盖多于百亩”)。邵博《闻见后录》则认为山谷之说“非是”;吴曾《能改斋漫录》卷十五认为“不应以多少分贵贱”;张溟《云谷杂记》更辨山谷不悟《玉篇》“三十步为畹”乃“三十亩为畹”之误,并认为“楚人于兰、蕙初无贵贱之分”。今天看来,强分兰贵蕙贱,实无必要,因为这一作法并不符合屈赋遣词造句之本意(例不征)。

《离骚》云:“朝饮木兰之坠露兮,夕餐菊之落英。”吴可《藏海诗话》载:“荆公诗云:‘黄昏风雨打园林,残菊飘零满地金。……’东坡云:‘秋花不似春花落,寄语诗人仔细看。’荆公云:‘东坡不曾读《离骚》。’”此事亦为宋人津津乐道。蔡條《西清诗话》、曾慥《高斋诗话》亦记其事。但蔡氏以东坡为欧阳修;曾氏认为“落英”,“大概言花衰谢之意”。《茗溪渔隐丛话·前集》卷三十四、《诗人玉屑》卷十七并录蔡、曾二氏语,而胡氏认为所谓欧阳、东坡诗不见二人文集,盖疑为后人杜撰;魏氏则曰“落之为义,始也,初也”。后人在“落英”的训解上打了不少官司,盖皆本于宋人议论。案:“落英”与“坠露”对文,“落”即“坠”意,不烦格物横议。

《离骚》云:“高余冠之岌岌兮,长余佩之陆离。”《对床夜语》卷一谓《诗》“充耳琇莹,会弁如星”(《卫风·淇奥》)、“駟马既闲,輶车鸾镳”(《秦风·驷驖》)之类“皆借服御以美其君”,《离骚》二句“是亦以服御自美也”。此解虽无深意,但以诗骚相量,亦不失为心得。

《九歌·湘夫人》云:“嫋嫋兮秋风,洞庭波兮木叶下。”《诗人玉屑》卷八引陈知柔《休斋诗话》盛赞后一句“陶写物象,宏放如此”。吴子良《吴氏诗话》卷上亦谓文字有江湖之思,始于此二句,“模想无穷之趣,如在目前”。案《湘夫人》二句为传世名句,宋人之论,得楚辞寓情于景之用心。

《九歌·大司命》云:“使冻雨兮洒尘”。曾季狸《艇斋诗话》云:“冻雨,暴雨也,出《楚词》。今《韵略》亦载,一作平声读,一作去声读。”吴聿《观林诗话》又云:“旧注云:‘冻(当作冻,下同)雨,暴雨也。’巴郡暴雨为冻雨。”案:《尔雅·释天》云:“暴雨谓之冻。”郭璞注:“今江东人呼夏月暴雨为冻雨。”陆德明《经典释文》云:“郭(璞)音东。”本此,字当读平声。吴氏承郭氏以方语释义,极有见地。今四川人称夏月暴雨为“偏东雨,”盖古语之遗。

《九辨》云:“悲哉秋之为气也,萧瑟兮草木摇落而变衰。愴慄兮若在远行,登山临水兮送将归”。《茗溪渔隐丛话·后集》卷一引严有翼《艺苑雌黄》谓潘岳《秋兴赋》用此语,“以登山、临水、远行、送归为‘四感’。予顷年较进士于上饶,有同官张扶云:‘曾见人言:若在远、行、登山、临水、送、将、归,是七件事’。‘予尝考《诗》之《燕燕》篇曰‘之子于归,远于将之。之子于归,远送于野’。一篇诗中亦用此送、将、归三字。然则《楚辞》之言,亦有所本也”。案:此论《九辨》写情用景物来烘托之法,颇为精细。其引张扶言,以《九辨》四句为七事,自然较潘岳“四感”之说更得文心。而宋人论诗,对古典名句颇喜这一类分条析缕的近乎咬文嚼字的评论。除诗话外,笔记亦乐于此道。如杜诗《登高》颈联“万里悲秋常作客,百年多病独登台”,罗大经《鹤林玉露》乙编卷五云:“万里,

地之远也；秋，时之惨凄也；作客，羁旅也；常作客，久旅也；百年，齿暮也；多病，衰病也；台，高迥处也；独登台，无亲朋也。十四字之间含八意，而对偶又精确。”这样读楚辞、杜诗和其它古典名著，也许有助于探求古人立意造句之法，但未免琐碎支离，颇似析字解经。

以上所论，举例而已。余如《茗溪渔隐丛话·后集》卷一引《文昌杂录》论《离骚》“筵等”旧俗，《对床夜语》卷一议《九歌·东皇太一》“蕙肴蒸”与“奠桂酒”的对仗问题，《观林诗话》释《远游》“沆瀣”之义，《韵语阳秋》卷十七辨《招魂》“六篋”旧注，等等，本文限于篇幅，就不一一论列了。

(三)

关于楚辞与历代文学的关系，宋诗话亦多有评论。寻其大旨略有二端：一是讨论楚辞在文学精神、文学体裁等方面与前代文学的关系和对后代文学的影响，二是讨论历代文学作品对楚辞文句的学习、模拟和借鉴。此盖诗话“备古今”的具体运用。其中虽有因袭前人的地方，亦不乏深思悟道的高论。请分论如下。

宋诗话论楚辞在文学精神、文学体裁上与前代文学的关系，一般皆以《诗经》为宗。如陈师道《后山诗话》云：“子厚谓屈氏《楚词》，知《离骚》乃效《颂》，其次效《雅》，最后效《风》。”此以《诗》议《骚》，不出前人成说。如前引王逸言屈原“依诗人之义而作《离骚》”，这个“义”，就不但包括了体，也包括了用。而姜夔《白石道人诗说》则云：

“诗有出于《风》者，出于《雅》者，出于《颂》者。屈、宋之文，《风》出也；韩、柳之文，《雅》出也；杜子美独能兼之。”这当然是推许杜诗。但只言屈、宋出于《风》，实属片面（参后所论）。

宋人不但讨论楚辞出于《诗》，还讨论诗骚以来的诗体流变，从中可见他们对楚辞文学地位的评价。《沧浪诗话·诗体》云：“《风》、《雅》、《颂》既亡，一变而为《离骚》，再变而为西汉五言，三变而为歌行杂体，四变而为沈、宋律诗。”这类议论亦为前人所乐道。如白居易《与元九书》云：“《国风》变而为骚辞，五言始于苏、李。”于颛《释皎然杼山集序》云：“《诗》自风雅消息，二百余年而骚人作。其旨愁思，其文婉丽，亡楚之变风欤？西汉，李陵、苏武始全为五言诗体，源于《风》，流于《骚》，故多忧伤离远之情。”宋人晁补之《离骚新序》亦云：“《诗》亡而后《离骚》之辞作”，“盖诗之流，至楚而为《离骚》，至汉而为赋，其后赋复变而为诗，又变而为杂言、长谣、……。”

以上引诸家言诗体流变，从现象来看似乎符合历代诗歌体裁的基本情况，但他们论其源流，却将复杂的问题简单化了。可惜这一问题题目太大，非本文所能详述。其中单就楚辞之体的产生和流变而言，也非三言两语所能理道。大体说来，诚如王国维《人间词话》所言：

“《沧浪》、《风兮》二歌，已开楚辞体格”。“《沧浪》、《风兮》二歌，已与《三百篇》异，然至屈子而最工。”这就是说，楚辞之体的产生不是（或曰不全是）来自《诗》。将包括楚辞在内的一切后来的诗体说成来自《诗经》，这是一种传统的宗经文学史观。宋诗话中的有关评论没有摆脱、也摆脱不了这一观念的束缚。（别详拙文《楚辞流变论》）

在宋诗话中论楚辞与历代文学的关系，现以文学史时代先后为序略作讨论：

关于楚辞与唐以前文学作品的关系，《后山诗话》云：“庄、荀皆文士而有学者，其

《说剑》、《成相》、《赋篇》与屈《骚》何异？”案《庄子·说剑》属“杂篇”，乃后学所作。其中议“天子剑”、“诸侯剑”、“庶人剑”，更似宋玉《风赋》议“大王之雄风”、“庶人之雌风”。而荀子赋，又别为一体。《汉书·艺文志》赋分四类，有屈原赋、荀卿赋、陆贾赋、杂赋之属。诚如章太炎先生《国故论衡·辨诗》所说：“屈原言情，孙卿效物”，“孙卿五赋，写物效情，《蚕》《箴》诸篇，与屈原《桔颂》异状。”说庄、荀之作与《离骚》相同，决非的当之论。《诗人玉屑》卷十三引《休斋诗话》又称陶渊明《归去来》高甚，“自出机杼”，而“汉武帝《秋风赋》尽蹈楚词，未甚敷衍”。此言反对生硬模拟，有一定见地。

宋诗话更津津乐道于楚辞与唐宋关系的关系。如《韵语阳秋》卷十五言刘禹锡“依骚人《九歌》作《竹枝词》九章”；《沧浪诗话·诗评》说“唐人惟柳子厚深得骚学”；《修辞鉴衡》卷一李颀《古今诗话》言“东坡称鲜于子骏所作《九诵》、以为有屈、宋之风”；《艇斋诗话》认为“山谷论诗多取楚词”；《珊瑚钩诗话》卷一及《彦周诗话》皆言晁补之诗文类《骚》；《韵语阳秋》卷十六谓“叶少蕴效楚人《桔颂》体作《梅颂》一篇”；等等。其中论李白、杜甫与楚辞的关系，颇值得一议。

《艇斋诗话》云：“古今诗人有《离骚》体者，惟李白一人。虽老杜亦无似骚者。”复引李白《远别离》、《鸣皋歌》，云：“如此等语，与《骚》无异。”而《韵语阳秋》卷三则云：“李太白、杜子美诗皆掣鲸手也。余观太白《古风》、子美《偶题》之篇，然后知二子之源流远矣。李云：‘大雅久不作，吾衰竟谁陈？王风委蔓草，战国多荆榛。’则知李之所得在《雅》。杜云：‘文章千古事，得失寸心知。骚人嗟不见，汉选盛于斯。’则知杜之所得在《骚》。”这两段话各持一端，表现出不同的文学见解。案：《艇斋诗话》之论颇有片面性。诚然，李白诗多得《骚》体之旨（参下论），而杜甫也并不是不学楚骚文学。其诗用楚辞文句之意，多得不能一一缕指，即如《乾元中寓居同谷作歌七首》，就是拟骚名篇，故李颀《师友记闻》认为：“李太白《远别离》、《蜀道难》，与子美《寓居同谷七歌》，风骚之极致，不在屈原之下。”至于《韵语阳秋》之论，亦未免太简单化。因为若论李、杜之源流，象他们那样的文学大家对包括《诗经》、《楚辞》在内的优秀文学传统自然是要全面学习和继承的。例如李白，固然在《古风》之一中嗟叹诗道式微，但他并不排斥楚骚文学传统。其《江上吟》有“屈平词赋悬日月”的名句，创作上更是学习骚体，写了包括《远别离》、《鸣皋歌》在内的大量名篇。再说杜甫，当然也不只是学骚。其《戏为六绝句》有“窃攀屈、宋宜方驾”之句，也有“别裁伪体亲风、雅”之句，因为他知道：“转益多师是吾师”。元稹就称他“上薄风、骚，下该沈、宋，古傍苏、李，气夺曹、刘，掩颜、谢之孤高，杂徐、庾之流丽，尽得古今之体势，而兼人人所独专矣”（《唐故工部员外郎杜君墓系铭并序》）。若从诗体看，倒是李白更喜欢无拘无束的骚体，杜甫则更工于近体律绝。此等情形前人所论甚详，今不赘述。

宋诗话论李、杜又与当时“李杜优劣”的争论相纠结。张戒《岁寒堂诗话》卷上云：“子美诗奄有古今。学者能识国风、骚人之旨，然后知子美用意处。”此论虽置于驳世人强论李杜优劣，然其旨意仍在推崇老杜。《苕溪渔隐丛话·前集》卷六又引“山谷云：子美诗妙处，乃在无意于文。夫无意而意已至，非广之以国风、雅、颂，深之以《离骚》、《九歌》，安能咀嚼其意味，闾然入其门耶？”这也是推尊杜甫。此宋代诗论宗杜之风使然，另

当别论。

需要指出：楚辞对后代文学的影响，不只是它的文学精神、文学传统、文学体制等方面的影响，也在于它的文句为后人作诗作文提供了学习借鉴的模范。诚如王逸《楚辞章句·离骚后叙》所云：“自终没以来，名儒博达之士著造词赋，莫不拟则其仪表，祖式其模范，取其要妙，窃其华藻。”刘勰《文心雕龙·辨骚》也说：“才高者莞其鸿裁，中巧者猎其艳辞，吟讽者衔其山川，童蒙者拾其香草。”刘氏将这一学习模拟分出了高下优劣。宋诗话中，对历代文人的这一学习模拟作了不少评论，下面略举数例，以见其大貌：

叶梦得《石林诗话》卷下云：“江淹《拟汤惠休诗》曰：‘日暮碧云合，佳人殊未来。’古今以为佳句。然谢灵运‘园景早已满，佳人犹未还’，谢玄晖‘春草秋更绿，公子未西归’，即是此意。”叶氏指出江淹乃模拟二谢，但他们又都是拟则《九歌》，所以叶氏接着指出：“尝怪两汉间所作骚文，未尝有新语，直是句句规模屈、宋，但换字不同耳。至晋、宋以后，诗人之词，其弊亦然。若是虽工，亦何足道！”叶氏反对生硬模拟，见解极为可取。前引《对床夜语》卷一亦反对“徒法其句”，二说可互参。

吴拜《优古堂诗话》云：“陆士衡乐府：‘游客春芳林，春芳伤客心。’杜子美：‘花近高楼伤客心。’皆本屈原‘日极千里伤春心’。”这是说二人皆拟《招魂》句意。

《对床夜语》卷一谓曹植、潘岳、谢灵运、鲍照等人作诗拟《离骚》“朝发轫于苍梧兮，夕余至乎县圃”句法；陆机、江淹拟《离骚》“朝饮木兰之坠露兮，夕餐秋菊之落英”句法。

《韵语阳秋》卷十六云：“《楚辞》云：‘折疏麻兮瑶华，将以遗兮离居。’瑶华谓麻之华白也。……所谓疏麻者，所以赠问离居也。”案：王逸解“疏麻”为“神麻”，此解为“麻之华白”，可备一说。葛氏又谓谢灵运《南楼迟客》、《越岭溪行》，骆宾王《思家》、钱起《题辋川》诸诗“皆用《楚辞》意，用于离居”。此论贯古今，亦颇得诸诗拟骚词意。又云：“至于（钱）起《赠赵给事诗》乃云：‘不惜瑶华报木桃’，则是以瑶华为玉，误矣。”检《诗·卫风·木瓜》有“投我以木桃，报之以琼瑶”之句，然则钱起用骚词未审其意，故云“误矣”。葛立方亦可谓熟读楚辞矣，故能纠正钱起之误。

《茗溪渔隐丛话·前集》卷二十载徐季海题希园禹庙诗，其中有“高阁无恢台”之句，黄庭坚认为：“《楚词》云：‘收恢台之孟夏’，恢，大也；台，即胎也。言夏气大而育物也。今言‘高阁无恢台’，直言无暑气耳，似不合古语。《尔雅》云：‘夏为长赢’，长赢即恢台也。若言‘高阁无长赢’，可乎？”案：《九辨》云：“收恢台之孟夏兮，然坎僚而沉藏。”洪兴祖《楚辞补注》用《舞赋》注释“恢台”为“广大貌”，朱熹《楚辞集注》同。此为迭韵词，故又作“恢良”（《文选·舞赋》）、“恢胎”（《后汉书·马融传》），亦广大之意。季海拟骚词，以“恢台”为名词，确如山谷之言，“似不合古语”；而庭坚又立新解训“大”训“胎”，亦未为的论，故后人如方以智《通雅》卷十二、张云璈《选学胶言》卷十四皆驳之。

从以上数例来看，宋诗话论历代文人对楚辞文句的学习和模拟，有一些意见很正确，如反对生硬规模；对前人在词藻、句法等方面学得较好的，能一一道出；对误解楚辞文句的，能批评指正。也有自立新解反而失误的。指出这一点，我们对宋诗话所谓的“辨句法”、“备古今”、“正讹误”的功用，就更有比较明晰的认识了。